

探访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

匠心传文脉
妙手修古籍

刘裕国



图①：彭德泉在修复古籍。刘一维摄
图②：鲁萌在修复古籍。邹清玲摄
图③：古籍修复成果展示。刘一维摄

多册古籍，打包堆码在墙角几十年了。”
彭德泉明白，修复古籍，必须先培养人才。他与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广汉市图书馆合作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培训班结业后，彭德泉从中招聘了一批员工，组建起广汉古籍修复基地。

创业之初，资金紧缺，设备不足，员工们自己出去捡石板、砖块当作压书板，将家具锯成木块代替压平机，把自家的箩筛拿来筛面粉、调制浆糊……在书库阁楼办公，面积只有10来平方米，层高仅2米，窗户窄小，光线昏暗，四五个人挤在一起，整理堆码在墙角近30年的200多包、2万余册古籍。每打开一包书，虫子迎面翻飞，老鼠毛、霉灰、纸渣呛得人睁不开眼，不断干咳，戴两层口罩也无济于事。清理一阵，就双手发红、痛痒难忍，得赶紧去清洗。

艰苦的条件、困难的工作，没有让修复师们打退堂鼓。年逾花甲的彭德泉，每天带头爬阁楼进行开包整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人抱怨，无人离开。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这批古籍的清理分类工作基本完成。

看着书库里有序排列的古籍，广汉市图书馆领导十分感动。上级单位领导来修复基地视察，也给予高度评价。

2008年9月，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在广汉挂牌成立。这是一家民办非企业性质的修复机构，于2013年初取得四川省文物局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具备了进入文物、档案系统和大专院校承接纸质文物的资格。2019年，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迁入洛带古镇，并在此创建了洛带·艺匠古籍文献修复博物馆。

让古籍重焕新生

在古籍文献修复博物馆展厅里，展示着一件件古籍文献修复成果。“我们对每一件古籍都怀有敬畏之心，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重焕新生。”彭德泉说。

清代李调元编印的《函海》是研究巴蜀地区历史、文学、金石学、民俗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这部丛书的纸张颜色比较特别，修复时需要配色素纸。工作人员用茶叶水浸染出与原书颜色相同的纸，不料10天后染色纸开始变色，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彭德泉立即请教专家顾问，综合专家意见后，采用陈茶煮水做染料。选茶、熬制、染色，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染制出与原书颜色一致且不会变色的纸。大部分书册糟朽无书衣（封皮），考虑到此书的价值和使用频率，修复团队决定用蜀锦作书衣，改四眼装订为六眼包角装订，以延长书籍寿命。这部古籍修复完成后，得到专家和收藏单位一致好评。

修复古籍，除了信息录入、清洁、消毒、配纸、染纸等前期准备工作外，还要经过托、补、裱、拆、锤、压、捻、齐、打眼、钉线、贴写书签等2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规范，要求修复师心细如丝。

博物馆里展示了各式各样的修复工具：用于揭启画芯和书页的竹启子，锤平补纸的木锤，裁补纸、绢、布等材料的马蹄刀……彭德泉很看重修复工具的制作，“做竹启子用的楠竹，是我带领员工去川南长宁竹海弄回来的。马蹄刀、木锤、钢钉，是我去木器厂和铁匠铺让师傅按照我们的要求制作的。我们还用中药材研制了纸质文物防虫防霉专用药，可以有效防止虫、霉对古籍的伤害。”

走进三楼的修复室，彭德泉现场演示了《宝贤堂法帖》的修复。这是四川遂宁市图书馆收藏

的明代十二卷木夹板朱拓从帖，有虫蛀、污渍、空壳脱裱、四周边沿磨损等问题，修复难度较大。彭德泉拿起马蹄刀，小心翼翼地把肉眼可见的泥点、虫屎等污垢一一剔除，又用羊毛排笔扫去灰尘。接下来，细致地清洗书叶，湿揭背纸，湿揭命纸（绢书画装裱后紧贴绢背的一层纸），将画芯脱裱的部分打浆、复位，再用汪六吉棉料宣纸更换原来的命纸。由于拓片存在掉色现象，彭德泉在修复过程中严格控制水分，采用“飞托法”上命纸，防止拓片掉色晕染到边条上。

除了古籍碑帖，彭德泉还带领工作人员修复过不少革命文物。“巴中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红色文献，包括红军布告、档案、标语、钱币、票据等，是我们用3年多时间修复、整理出来的。修好的文献交付给博物馆，得到了专家和馆方高度肯定。不久前，博物馆举办的庆祝建党百年专题展中展出了这批文献。”彭德泉自豪地说。

传承工匠精神

走进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研学培训基地，“鲁萌工作室”的标牌十分醒目。工作室里这个面容清秀的姑娘，从事古籍修复已有十余年。2009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的鲁萌偶然接触到古籍修复，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她放弃了收入较高的汽车销售工作，来到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鲁萌的执着与刻苦打动了彭德泉，修复中心将她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先后推荐她参加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文物局举办的纸质文物修复和传拓技艺培训班、研修班，她都取得优异成绩。2013年，鲁萌拜古籍修复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杜伟生为师。在名师指导下，她的技艺一路精进，逐渐成长为修复中心技术骨干，牵头完成了多个国家级修复项目。2019年，成都市委、市政府命名表彰首批“成都工匠”，鲁萌榜上有名。

在修复中心里，像鲁萌这样的青年修复师还有不少。杨世全原来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起初，彭德泉对于他能否静下心来学习有些怀疑，但他竟耐住性子接受了长达9个月的岗前培训，并以满分的成绩通过了上岗考试。在修复实践中，杨世全练就了过硬的技术。

陈亚是一名聋哑人。10年前，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学习。经过长期艰苦的技能训练和专业学习，她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修复师，获得2020年“成都工匠”荣誉称号。

“我们中心现有员工50名，其中有不少高学历人才，他们组成了古籍修复和整理、普查、传拓团队。此外还有近20位国家级古籍修复大师组成的专家顾问团队。”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主任、理事长彭克说。

彭克原是成都市某文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多年来，他看着父亲彭德泉忙碌的身影，对于古籍文献保护的重要意义深有体会。考虑到父亲年龄大了，还患有脑梗，2018年，彭克毅然辞职，继承父亲的事业。他给修复中心带来了新的理念和现代化管理模式，让修复中心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2020年9月，1300多平方米的四川西部文献修复研学培训基地在洛带古镇建成开放。基地设有研学培训教室、古籍修复体验区、字画碑帖修复装裱体验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等，集专业人员培训、中小学生学习、非遗展示于一体。

如今，古籍文献修复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修复师们的巧手慧心，让蕴藏在古籍碑帖里的文脉赓续传承，也越来越多人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国博推出商周青铜鼎特展

三大宝鼎联袂亮相

本报记者 邹雅婷



展厅里的西周大克鼎。

杜建坡摄

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青铜礼器之一。商周时期青铜器器型有圆鼎和方鼎之分，圆鼎出现较早，流行时间较长，数量也较多。在目前所见的商代青铜圆鼎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子龙鼎是体量最大的。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孟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最负盛名。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上海博物馆推出“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子龙鼎、大孟鼎、大克鼎联袂亮相国博，与观众“零距离”对话。

走进展厅，只见三大宝鼎以裸展的形式立于展台上，尽显庄严气势。子龙鼎是三鼎中最大最重的，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整器造型雄伟稳重，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子龙鼎相传为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来，后人藏国博。

大孟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铭文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周康王向孟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孟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孟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瀾起伏、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和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负责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辈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煌煌巨篇。

大孟鼎、大克鼎均出土于陕西，为清代官员、金石学家潘祖荫所得。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埋藏于苏州潘宅地下。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双鼎捐赠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人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开馆，大孟鼎应征北上，大克鼎则作为“镇馆之宝”留在上博。

“大孟鼎、大克鼎和子龙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圆鼎的经典之作，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它们出土、流转和归属的经历，也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翟胜利说。

此次展览汇集了30余件商周时期极具代表性的青铜礼器，参与展出的还有铸铜陶范和大孟鼎、大克鼎、毛公鼎的几种珍贵拓片，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铭文、制作工艺等方面综合呈现商周青铜礼文化的丰富内涵。

体验民俗迎中秋



中秋节来临之际，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街小学开展“品味中秋民俗 传承节日文化”主题活动，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制作月饼、中秋花灯、彩绘兔爷等，体验中秋传统民俗。图为小学生展示彩绘的兔爷。丁根厚摄/人民日报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光华道幼儿园开展“花好月圆 古韵迎中秋”主题活动。孩子们穿汉服、画灯笼、赏花灯，喜迎中秋节到来。图为小朋友们在彩绘灯笼。朱大勇摄/人民日报



来自上海的小朋友在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研学培训基地体验古籍修复。邹清玲摄